

孟子百家智慧文库

孟子的智慧

廖名春 著



孟子的智慧

廖名春 著

一九九二年七月·延吉

诸子百家智慧文库

主 编 舒大刚 黄 浩

副主编 谢 挺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海平 李景林 金东勋 张 凌 张希峰

官长为 康学伟 梁韦弦 黄 浩 谢 挺

崔厚泽 蒋荣昌 阎 忠 舒大刚 廖名春

第一辑:

孔子的智慧 舒大刚著

孟子的智慧 廖名春著

庄子的智慧 张 晋著

荀子的智慧 廖名春著

韩非的智慧 黄 浩著

纵横家的智慧 谢 挺等著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生平与时代	14
第一节 家世和青少年	14
第二节 游说诸侯	19
第三节 晚年著述	29
第四节 时代背景	32
第二章 人性论	37
第一节 孔子论人性	37
第二节 告子论人性	42
第三节 孟子人性概念的剖析	45
第四节 性善的论证	48
第五节 性善论的价值	57
第三章 伦理思想	62
第一节 四德与五伦	62
第二节 义利之辨	72
第三节 内圣之道	82
第四章 仁政学说	92
第一节 王霸之辨	92
第二节 以民有恒产为中心的经济理论	103
第三节 以尊贤使能为重点的政治理论	117

第五章 民本论与朴素民主观	126
第一节 民本与民主.....	126
第二节 以重民为特征的民本论.....	130
第三节 以民贵君轻说为代表的朴素民主观.....	134
第六章 哲学思想	142
第一节 天命观.....	142
第二节 认识论.....	151
第三节 方法论.....	160
第七章 雄辩之术	168
第一节 以气势取胜.....	168
第二节 雄辩有术，议对有方.....	172
第三节 长于譬喻.....	179
第八章 孟子与六经	184
第一节 孟子与《诗》、《书》.....	184
第二节 孟子与《礼》、《乐》.....	191
第三节 孟子与《易》、《春秋》.....	194

绪 论

孟子，是先秦儒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长期以来，他被人们尊为“亚圣”，奉为孔子思想的正宗嫡传。在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中，除了孔子外，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恐怕就要算孟子了。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开始了孟子思想的研究。荀子《非十二子》声讨孟子之罪，认为他与子思“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①其《性恶》篇又屡批孟子性善论，认为孟子“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荀子的批评，从反面证明了孟子思想及其学派在战国末期的强大影响。《韩非子·显学篇》也说：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韩非所谓“儒分为八”中，就有“孟氏之儒”。战国末期儒家各派竞争正统，孟子学派参预其间，自然引起相互之间的批评、驳议，而对孟子思想的研究，就由此揭开了序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焚书坑儒，“孟子徒党尽矣”^②。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汉文帝时，《孟子》即列入官学，置传记博士。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孟子思想从此就成为传统的正统思想。司马迁作《史记》，将孟子写入列传，除简单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学说外，还分析了孟子思想不显于战国之世的原因，说：

“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并说：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东汉光武帝时，《孟子》博士虽被取消，但白虎观诸儒说经，仍多称引《孟子》。^③

从西汉开始，人们就开始为《孟子》作注。据文献记载，刘向可能为《孟子》作过注。东汉则有赵岐注、程曾注、高诱注、郑玄注、刘熙注，其中影响最大，并一直流传至今的则为赵岐注。

赵岐应为孟学第一功臣。他注《孟子》，先将其分为七篇，每篇取首章二、三字为题，又将每篇分为上下两卷，然后再作章句。我们见到的《孟子》一书，其形制即为赵氏所定。赵岐的训诂之功，阮元早有定评：

“赵岐之学，以较马、郑、许、服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废。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今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④

赵岐又著《孟子题辞》，^⑤盛赞《孟子》一书，内容“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灿然无所不载”；认为其功用无穷，“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其文章“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所以，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孟子的“亚圣”之称，由此而开始。

这时，以王充为代表的思想界的非主流派，则继承荀子的批判精神，对《孟子》展开了攻击。《论衡·刺孟》篇一连举出十五个问题非难、抨击孟子，尽管有些观点过于偏激，有些论据有欠充分，但确实也击中了孟子思想的一些症结。王充的刺孟，直至今今天还有相当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直至中唐以前，孟子之学不显。陆德明《经典释文》不为《孟子》作“音义”，后来方有张镒《孟子音义》、丁公《孟子手音》之作。但“唯是音释，二家撰录俱未精当；张氏则徒分章句，漏落颇多；丁氏则稍识指归，伪谬时有”，^⑥水平不高。

到了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知识界的主流，则竭力推崇孟子。韩愈视孟子为道统的最后一人，认为孟子是“醇乎醇者”，“功不在禹下”，“赖其言，至今学者尚知尊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⑦韩愈之说对后人、尤其是宋人影响极大。

到五代时，后蜀刻《孟子》于石经，这标志着孟子的正统地位又开始恢复了。

宋代，孟子的政治地位和孟子研究都达到了鼎盛。北宋时，尽管有李觏、郑厚叔、司马光反孟、贬孟之说，但王安石以《孟子》取士，《孟子》又一次成为官学。及至南宋，理学家二程更奉孟子为“大贤”，从此，“圣贤”之“贤”，就有了专指孟子一义。

宋代治孟之作空前繁荣，其形成分为三种，一是注疏，二是传说，三是考辨。注疏之作，最为知名者首推孙奭的《孟子正义》，该书后被收入钦定的《十三经注疏》中，流传颇广。但此书是否确系孙氏之作，自朱熹起就有怀疑。但孙奭确有

《孟子音义》二卷传世。宋人最好的孟子注是朱熹的《孟子集注》，此书以理学为主导，融会诸家之说而成一家之言，简明扼要，于文义颇得其旨，为学谨严，疑而不决处便存疑，是继赵岐注后又一重要的《孟子》注本。此外，朱氏还有《孟子集义》十四卷，但质量不如《集注》。总的说来，朱熹可称为孟学的第二功臣。除朱氏之作外，宋代的注疏还有真德秀的《孟子》十四卷、蔡模弟兄的《孟子集疏》十四卷、赵顺孙的《孟子纂疏》十四卷，吴真子的《孟子集成》等等。

宋人传说之作有苏辙的《孟子解》二十四章、张九成的《孟子传》二十九卷及《孟子解》十四卷、朱熹《四书或问》中也有《孟子》十四卷、张栻《癸巳孟子说》七卷，此外尚有旧题尹焞的《孟子解》二卷、旧题朱元晦的《四书问目》。这类著作较早的是苏氏之作。

宋人考辨之作有司马光的《疑孟》一卷，余允文的《尊孟辨》三卷和《续辨》二卷、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七卷、托名王应麟的《论语孟子考异》二卷。其中金氏之书于孟子事迹考证尤多，颇有价值。

孟子思想对宋代理学家影响至深。理学家致力于道德性命“内圣”之学，都以孟子的性善论为理论依据。孟子的义利观、尽心知性知天观、^⑥仁政学说，都为宋儒所继承。特别是心学派的陆象山，其学更是直接读《孟子》而来，他的发明本心足矣，毋需别言格物之说，明显是脱胎于《孟子》，是从孟子的心性之学中生发出来的。此后，而至明王守仁，心学一系都归宗孟子。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从此，孟子的“亚圣”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

元代孟子被封为“邹国亚圣公”，但孟子研究无甚新意，

只是步朱熹《集注》之后尘，只有朱公迁的《四书通旨》稍值一顾。

至明，《孟子》一书又遭厄运。朱元璋读到《孟子》“民贵君轻”和“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甚为震怒，下令取消孔庙中孟子的牌位，要撤掉其“亚圣”的桂冠。但至永乐年间，胡广奉敕撰《四书大全》，明成祖亲为其作序，这样，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其地位就超过了《五经》。以后二百余年，被尊为科举取士之制，成为时人的基本读物和文人仕进的敲门砖。

明人的治孟著作大多不出朱熹《集注》和胡广《大全》的窠臼。但万历以后有所转机，也出现了一些与荀子、王充精神有一定相通的著作，如高拱的《问辨录》、姚舜牧的《四书疑问》、寇慎的《四书酌言》、鲁论《四书通义》、谭贞默的《三经见圣编》等。在考证上也出现了薛应旗的《四书人物考》、陈禹谟的《别本四书名物考》、陈仁锡的《四书考》、陈鹏霄的《四书经学考》等等。这些书虽不能称为精当，但它们旁征博引，开了清人考据之风。

清初康熙作《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陆陇其作《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和《孟子集注大全》十四卷、王植撰《四书参注》、王步青作《孟子本义汇参》，皆为宋学一系著作。黄宗羲有《孟子师说》二卷，偏重推究事理，对异说多有驳难。而毛奇龄又撰《四书剩言》四卷、《补》二卷，善于辩论而长于考证。阎若璩有《四书释地》，在孟子生平年月、《孟子》作者等问题上进行了精细的考证。崔纪的《读孟杂志》一卷，则认为《孟子》大旨出于《大学》。

乾嘉之际，孟学大家迭出。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三

卷，用范畴研究的方法，采取答问形式对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该书“抉摘宋明理学之弊，卓然自成一家言，其意不在专释《孟子》”。⑩周广业有《孟子四考》，即“逸文考”、“异本考”、“古注考”、“出处时地考”，其论证充实，考核翔实，不少成为定论。崔述撰《孟子事实录》，对孟子事迹及《孟子》的某些篇章多所考证，成绩斐然。此外，翁方纲还有《孟子附记》二卷。

道光年间，焦循撰《孟子正义》三十卷，此书以赵岐《章句》为基础，考核精细，资料繁富，集历代《孟子》研究之大成，人称“清儒注《孟子》，焦书最完善”，⑪应不为过。因而此书从清代以来，流传颇广。因此，焦氏可谓孟学的第三功臣。此后，董锡嘏撰《孟子集注指要》、凌江撰《孟子补义》、施彦士撰《读孟质疑》、宋翔凤撰《孟子赵注补正》、丁大椿撰《来复堂孟子讲义》诸书。同治、光绪年间则有姚开元《孟子校异》、陈世鏞《孟子俟》、罗泽南《读孟札记》、汪宗沂《孟子释疑》、姜郁嵩《孟子说》、陈矩《孟子弟子考补正》、俞樾《孟子评议》、谭诂《孟子辨证》、沈梦兰《孟子说》、桂文灿《孟子赵注考证》、沈保靖《读孟集说》、康有为《孟子微》等作。这些著作考证精审者要算俞樾之作，有特色者要算康有为之作。

五四以后，治孟著作层出不穷。注释类的有杨伯峻的《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史次耘的《孟子译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刘方元的《孟子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等等，选本则数不胜数。其中以杨伯峻之作质量最佳，影响最大。综合研究类的有钱穆的《孟子要略》（大

华书局，1934）和《孟子研究》（开明书店，1948）、杨大膺的《孟子学说研究》（中华书局，1937）、陈大齐的《孟子待解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董洪利的《孟子》（中华书局，1983）、吕涛的《孟子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王其俊的《孟学新探》（济南出版社，1990）、谭承耕的《〈论语〉〈孟子〉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梁韦弦《孟子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1992）。考证类的有罗根泽《孟子评传》（商务印书馆，193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6）、陈训章的《孟子管窥》（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以及孙开泰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成果以钱穆最为显著。专题研究类的有陈顾远的《孟子政治哲学》（泰东图书局，1922）、李慎言的《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易社，1931）、唐林泉的《孟子政治思想新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陈大齐的《孟子名理思想及其辩说实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和《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说的比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滕春兴的《孟子教育哲学思想体系与批判》（台湾正中书局，1983）、陈圣勤的《孟子文辞今析》（台湾正中书局，1980）、《孟子文法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64）。此外，还出版许多论文集，如王兴业编的《孟子研究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4）、谢祥皓编的《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赵宗正等编的《孔孟荀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杨化之原编、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改编的《孟子研究集》（台湾，1963）等等。除了这些孟学著作之外，许多的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以及散见于各杂志的大量论文，都对孟子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其影响并不在上述专著之下。

五四以来的孟子研究，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冲破了经学的藩篱，将孟子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亚圣”来对待。因此，人们在孟子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成果。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首开以近代科学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的风气。^①胡适认为性善论是孟子哲学的中心问题，孟子由性善把个人人格看得重要，有一种平等主义，他的政治哲学很带有尊重民权的意味。又说孟子哲学是“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多享幸福。孟子也是功利主义者，他讲的“仁义”是最大多数的最大乐利。梁启超在性善论和民权主义等问题上观点接近胡适，但他不赞同胡适关于孟子主张功利的说法，认为孟子最大特色在排斥功利主义，注重道德较之追求物质为高尚。^②冯友兰承认孟子政治观为守旧的，但又认为孟子实际上已将先王之法理想化、理论化了，因而具有改良倾向，如将井田制度改变为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他还认为孔子只及于“内圣”，孟子则更及于“外王”；孟子为软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心论的倾向，荀子为硬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物论的倾向。^③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许多学者又开始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孟子。吕振羽认为孟子并非民权主义者，而是一位初期封建制度的拥护者。战国时代，新兴封建地主——商人经济有了发展，而孟子仍站在贵族领主立场上，要求息灭新兴封建地主的进步思想和农民革命思想。孟子思想一面有着人本主义因素，另一面他的性善论却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并用来麻痹被统治阶级，隐蔽不同的阶级性。孟子所说的“民”是知识分子、地主和商人等，而不是农奴。

因此，孟子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⑭杨荣国认为孟子维护种族奴隶制，他提倡公田制是反动的，目的是要摧毁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制。他的井田制和“周室班爵禄”，是从经济上与政治上维护周统的两大“造说”。杨氏还认为《孟子》中的“民”是由百官没落下来的自由民，所谓“民为贵”，不过是重视自由民的地位。孟子的哲学思想是发挥子思先验的“诚”，加强内观工夫，所谓“求放心”，“存夜气”，形成严密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孟子的“仁义”、“仁政”是欺骗被奴役人民，借以加强统治者的宗族团结。^⑮范文澜认为孟子的井田制实际是要地主回到领主、农民回到农奴的地位上去，但他的仁政学说含有不少独辟的积极思想，是封建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他的哲学思想是性善论，是从统治阶级看本阶级的性是善的，所以本阶级的理义也是善的。被统治阶级的人当他对于理义表示顺从时，性也是善的，表示反对时，那就是性恶的禽兽。^⑯侯外庐等人则认为孟子的阶级立场不主张在贫富关系上破坏已往的阶级制度，他的“正经界”是恢复周制的论调；孟子有一定的人民性；他的“思诚”扩大了人性中的义理性，减低了天的宗教性，“性”可以备万物，性善论把“诚”更理论化了。^⑰

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给孟子研究吹进了一股清风，从社会历史的广阔背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认识孟子的思想，解决了不少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也矫正了五四以来孟子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偏向。但勿庸讳言，这种研究中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硬贴标签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发展到了顶峰，结果导致了对孟子、对孟子思想

的全盘否定。打倒“四人帮”后，这种倾向才开始得到纠正，孟子研究才又走向了繁荣。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对孟子的阶级属性、哲学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历史观与天命观进行广泛的讨论、深入的探讨。有人认为孟子代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政治上是反动的；有人则认为孟子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政治上是进步的；有人则认为他代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属于地主阶级中比较温和、保守的一派。对于孟子的哲学思想，有的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有的认为为客观唯心主义，有的则认为是唯物主义的。对于孟子的伦理道德观，有的认为是先验的唯心主义；有的否定这一观点，认为所谓“四端”与经过培养后的既成形态“仁、义、礼、智”是不同的，孟子性善论的着眼点正是要从人类带有遗传性的某些内在本性、本能或天生资质中探寻道德的起源；有的认为孟子是使中国封建道德条理化的第一人，他的性善说，并不是说人生来的本能都是善的，而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善的。对孟子的认识论，有的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有的认为它有一定的科学基础；有的认为它大体上是唯心主义的，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富有启发性的和能够深化人们认识的思想。孟子的政治经济思想，有的认为主要表现在“施仁政”、“行王道”二个方面，倾向于肯定；有的认为是逆潮流而动的，倾向于否定；有的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采取“王道”和“武力”两个政策，以争取民心为主，以武力统一为辅。孟子的历史观与天命观意见分歧也很大，有的认为孟子是宗教有神论的天命观；有的认为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是唯物主义的；有的认为他的历史观是“先知先觉”的

英雄史观，在天命观上，他摆脱了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赋予“天”以道德属性。尽管在孟子及其思想的研究上存在着如此大的分歧，但总的来说，人们的研究态度正变得越来越客观，研究方法正趋于越来越多样，认识也越来越细致、深入。

纵观以往的孟子研究，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一是主观性。不从孟子思想的实际出发，乱贴标签乱划线，按照流行的理论模式往孟子身上套。这种学风在“评法批儒”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今仍有市场。如《孟子》中的“民”，本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或泛指一切人，或专指被统治者，只要看看《孟子》就会清楚。可是有的人为了否定孟子的“民为贵”说，硬要说孟子所谓“民”，不是指下层人民，也不是中小地主，而是指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孟子主张“定于一”，有人说这是奴隶主的统一，非封建主的统一。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实际是无助于孟子思想研究的。对孟子的思想，人们习惯于唯心、唯物的划分法，因此将孟子一些本身并不回答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这一哲学根本问题的观点也硬划分为唯心或唯物，比如“万物皆备于我”这一段话，本来是讲境界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就一直认定它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论点，这完全背离了孟子的原意。

二是片面性。对孟子思想各取所需，不问其余，以致往往对同一问题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如孟子的“天”范畴，有的认为是主宰之天，有的认为是自然之天。讲主宰之天的，就不顾自然之天的事实；讲自然之天的，对主宰之天的存在也不加以解释，结果各执一端，相持不下。

三是功利性。许多人研究孟子，喜欢根据政治功利而任

意歪曲孟子思想，这存在两种极端：一是从反传统的立场出发，肆意贬低孟子。如孟子的仁政学说，有些人一口咬定其实是历史的倒退；孟子所讲的井田，疑古派人士否定它有历史的根据，认为是孟子的胡编乱造。二是为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不惜美化孟子。如孟子和告子论性，孟子理论上的漏洞和逻辑上的失误确实存在，告子有些论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有些人、特别是某些台湾学者，千方百计贬低告子，为孟子的失误辩护，不遗余力地证明性善论这种先验道德论的正确性。这种努力据说是为复兴中华文化，可告子也不是印度人呀？

四是重复性。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通病，孔孟的研究最为突出。就孟子研究而言，大部分书、文章了无新意，陈陈相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注意查阅文献。某个问题前贤今人已研究得很透彻了，已经成为定论了，许多人还在埋头苦干，结果造成无效劳动。这固然与客观条件有关，但也和我们的主观意识、研究方法有关。

说实话，上述四个问题笔者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也的确难以幸免，这里提出来，只是想和读者们共勉。本书准备在广泛吸取前贤时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原则和辩证方法为指导，将考据和义理相结合，对孟子的生平和思想进行系统的探讨。这种努力是否会成功，还有待于读者诸君的回答。

注释：

- ①详见拙文《思孟五行说新解》，《社会科学战线》即刊。
- ②赵岐《孟子题辞》，见《诸子集成》本《孟子正义》。